

抗战时期在李庄的外国学者(上)

□桑宜川

如今在中国,地名被称作“李庄”的犹如过江之鲫,你随意去某省旅游,冷不丁地拦住一个人问路:“李庄在哪里?”说不定对方会在一愣神之后认真地回答:“你问的是哪个县的李庄?”

但在上世纪的抗战岁月里,不论你在国内甚至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李庄”的字样,那么邮件就一定会通过邮政准确无误地寄往那唯一的李庄,那个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陕西古路坝一同被誉为四大抗战文化名镇的李庄坝。当年,西方盟国的一些大学及科研机构,也常收到“中国李庄”交换的学术刊物和书籍,虽然那里只不过是破庙祠堂,民宅农舍,却庠序如旧,却弦歌依然,因为那里汇聚过太多的中国知识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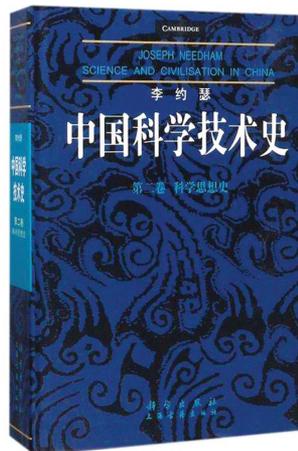
笔者在李庄同济大学旧址留影。



李约瑟与罗忠恕(右一)等中国学者合影。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肆 一道谜题 求解“李约瑟之问”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随后的几十年中,这部巨著的其他卷册陆续出版。著作以浩瀚的史料、令人信服的证据,第一次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诚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内容洋洋洒洒,包罗万象,涉及从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军事技术,到生活中各种小发明,例如雨伞、风筝、乐鼓、瓷器、围棋,甚至具有香味的卫生纸等诸多内容。有人称这部巨著是剑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学术的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是相关领域每一位学者都不可绕开的著作。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让他享誉国际学术界。1974年,李约瑟博士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1994年,李约瑟博士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如同现代中国的学术大家钱学森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一样,大半多个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李约瑟早就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李约瑟之问”,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要解答这道难题其实很复杂,除了各种历史因素之外,需要从中国人的思维深层结构中去寻找答案。

到今天回望,我们还应当感谢鲁桂珍,因为她的原因,使中国人民多了一位坚定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他曾长期担任中英友好协会会长,使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研究领域多了一位巨擘,使中国古代辉煌的科学历史让更多的外国人所了解,使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西方系统严谨逻辑推理考证,也使中国人自己多了一本从外国学者角度看的古代科学史巨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壹 海外学者 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那年那月,不仅众多中国学术大家,不少外国学者也“落户”李庄,一时士者云集,人文荟萃。外国教授魏特、史图博、鲍克兰、史梯瓦特、德国华裔学者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逃难迁徙李庄;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教授携夫人多萝西(汉名李大斐)、助手鲁桂珍及考察团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携夫人费慰梅女士及两个女儿,都曾先后造访过李庄;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生活多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朝夕相处,切磋学艺,度过一段人生难忘时光;抗战后期,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罹患重病,最后竟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异国之魂。

对于当年这些与中国学者同甘共苦的海外学者,似可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教授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的许多重要史料,就是在李庄从傅斯年先生主持的史语所获取的,见证了在抗战时期李庄已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重镇。

英语词汇中有一个外来语Chinoiserie,原本出自法语,似可译作“中国风”或“中国时尚”,是明末清初时期西方贵族阶层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的一个表达方式。这种中国风尚曾体现于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并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受“中国风”影响的洛可可风格与中国式园林曾在欧洲各国王室流行,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后期以降才逐渐消退。作为观照,英国学者李约瑟(1900—1995)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讲述了过往的华夏文明,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发明的崇尚,如果说其学术思想与治学思路与“中国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背景关联,应该不是妄语。

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发,写作思路就成型于“中国李庄”。故事源起于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有幸被选中。当年他已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组成了英国文化科学使团,代表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前往中国。

贰 旷世奇恋 李约瑟与鲁桂珍之爱

1943年初,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的天堑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高空,进入云南昆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在华考察生涯。在昆明逗留期间,李约瑟访问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学和工程研究所,并为这几家科研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紧缺物品。随后,李约瑟一行由昆明飞往重庆,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馆长,办公地点设在英国驻华使馆一侧的平房内,人员由六位英国科学家和十位中国科学家组成。

1943年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之旅,从而有了与李庄科学、教育界接触交流的机缘。随行的还有李约瑟的原配夫人多萝西(汉名李大斐)与中国女学者鲁桂珍,这也使李约瑟的科研走上了不同于一般西方科学家的道路,演绎出了一段中西旷世奇恋。

李约瑟与鲁桂珍相识于1937年,当时,鲁桂珍已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生物化学研究人员,她头脑聪明,富有魅力,十分迷人。据说鲁桂珍33岁那年远渡重洋,到剑桥去拜见了当时国际生物化学界中她最仰慕的一对夫妻,李约瑟夫妇,并与他们一起共事。邂逅不久,李约瑟与鲁桂珍双双坠入情网,不能自拔。李约瑟日记里记载了这段情事的全过程:他们一起到剑桥镇上共进晚餐,晚上一起看电影;手挽手在积雪覆盖的后院散步,或者沿着剑河冰冻的河岸一直散步到格兰特切斯特;到法国阿瓦岛短度假,西方的人文浪漫尽显其中。

李大斐对这一情事了如指掌,倒不是因为李约瑟或鲁桂珍都不隐瞒对彼此的好感。李大斐完全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她的日记里,都没有自艾自怨。那年冬天,他们3个人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经常一起外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科学话题要谈。毕竟,李约瑟和李大斐两人都乐意让来自中国的客人了解剑桥迷人的生活琐事。当冬天完全笼罩着剑桥时,他们三人有许多时间是挤在当地小酒吧里烧得很旺的炭火前度过的。从各种记载及从李大斐的私人信件来看,她非常喜欢鲁桂珍,钦佩她的智慧、决心和勇气。

1987年,李大斐病故。1989年,李约瑟与鲁桂珍结婚。此时两人都已年逾八旬,白发苍苍。这段爱情,诚如刘鹗在《老残游记》中之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叁 志趣相投 李约瑟与傅斯年的友谊

1943年6月初,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地区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的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后改称慧光寺)中的同济大学校本部。在校方的安排下,李约瑟为同济大学生用德语做了四次科学演讲报告,并会见了同济大学著名教授傅斯年、董第周、梁思成、董作宾、李济等著名学者。

翌日下午,李约瑟一行移往板栗坳等地,开始对李庄的其他科研机构考察访问。李氏在他后来的游记中记载道:“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这段引文见证了李庄当时的人文盛况。

其时,傅斯年先生已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两人相识后,志趣相投,很快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由于傅斯年的慷慨热情,李约瑟还在傅斯年家住过一晚,促膝交谈。访问期间,李约瑟在板栗坳亲眼目睹了史语所保存的国家级藏品,例如无以记数的铜器、玉器和著名的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等。

此外,李氏还观摩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代的皇室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当他看到语言学组拥有的每一个省份方言的留声机唱片,方志图书中的宋朝书画真迹,活字版印刷排版工具等等,赞叹有加,更坚定了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信念。

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约瑟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后来对他的妻子李大斐表述道:“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为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李约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尚,由此可见。